



宗教·哲学
——
艺术

陈昌文/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宗教·哲学

艺术

陈昌文／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哲学·艺术/陈昌文 主编 .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10

ISBN 7-80123-213-5

I. 宗… II. 陈… III. ①宗教 - 文集 ②哲学 - 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 第 30002 号

宗教·哲学·艺术

陈昌文 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 32 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23355-2504

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陈红星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30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123-213-5/B·24

定价:18.00 元

前　　言

中国近年来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各方面发生的深度变化，拓展了两岸三地长期从事哲学、宗教、艺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的探索新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香港回归，海峡两岸交往日益频繁，将对祖国内地及港台地区的哲学、宗教、艺术产生怎样的影响；两岸三地的哲学、宗教、艺术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怎样，有哪些特征与差异；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能否促进其多元互动的局面；感性的学理与理性的形象表达的跨世纪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两岸三地的学者们在这三个人文核心领域中孤独而执着探索时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由香港其士文教基金会有限公司资助，四川大学哲学系、宗教所、艺术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哲学、宗教、艺术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研讨会”正是因上述背景，于1998年11月在成都举行。此次跨学科、跨地区，旨在促进祖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哲学、宗教、艺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学术会议，共收到60多篇论文。本文集编委会从中精选出32篇，另附6篇论文摘要，分“宗教之思”、“哲学之思”、“艺术之思”、“论文摘要”四个部分编辑出版；力图有助于这些学科及领域的多向参照，多元互动，优势互补局

面的形成，也是对构建大文科学术背景做出的积极尝试。

我们发现，作为智识活动前沿的哲学、宗教学与艺术学在该文集的采样中，形上的疑问多于信仰，但信仰却被视为传统的资源在当代符号中悄悄延伸，而长期附着于艺术的美学热情和政治关怀则泛化为对民族心理与文化背景的具体考察。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学术活动的至诚与孤独，同时促进了学者们的宗教关怀与社会关怀，这种宽容的态度转换，正是人类面对新世纪作出的承诺。

陈昌文

1999年3月

目 录

前 言	陈昌文	(1)
宗教之思		
论宗教对文化的影响	冉昌光	(2)
宗教的对象、语言、使命	查常平	(14)
元代前期统治者崇道政策初探	卿希泰	(26)
佛教与中国民族精神	向世山	(46)
佛教禅宗的“实学”思想探析	黄德昌	(52)
世纪之交中国佛教的回顾与展望	陈 兵	(60)
论道家、道教的生态思想 ——兼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李远国	(73)
道教人格的历史概观	陈昌文	(87)
论葛洪对中国美学史的几点贡献	潘显一	(117)
羌族信仰调查报告	倪云鶴 王毅杰	(126)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桃坪乡宗教建筑遗存及相关法器调查	四川大学哲学—艺术学院 98 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课题组	(134)

哲学之思

宗教之思与哲学之思	余 平	(153)
上帝: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与作为科学的对象	蒋荣昌	(171)
“上帝之死”与虚无主义批判	陆 沉	(180)
人生境界与宗教	成 穷	(189)
道教反传统派的生命哲学	李 刚	(198)
怀疑论:健全信仰的桥梁	刘 莘	(214)
中西两种文化传统探源	李亚宁	(224)
理性与信仰之遇 ——苏格拉底之死的昭示	吴 军	(228)
宋代理学义利论的内在矛盾	陈廷湘	(236)
中国文化中的理性化及其文化后果 ——以孔子和老子为例	萧进铭	(241)
当前台港与大陆儒学研究之比较	白 冰	(252)

艺术之思

创作冲动与不朽意识	冯 川	(263)
“乐以忘忧”:儒家人生观之美学底蕴	李天道	(272)

佛教与中国文学 ——孙昌武佛教文学研究述评	彭 彤	(283)
佛学禅家的审美人生境界	张小元	(291)
禅宗与中国绘画艺术	王永会	(301)
中国佛教美术装饰纹样 ——莲花纹、忍冬纹探源	卢 丁	(310)
我国古代的罗汉信仰与罗汉艺术	黄宗贤	(319)
丽江洞经音乐 ——一项文化融合的遗产	杨曦凡	(328)
对儿歌案例的“信仰—依赖性” 投射测验分析	秦 伟	(334)
投射技术对传统七情概念的实证 研究	胡冰霜等	(343)

摘要

三星堆与中国早期宗教及艺术	李伟刚	(352)
道教是多神教吗	丁培仁	(355)
唐君毅先生的宗教本质观	曾纪茂	(362)
唐甄理学及其启蒙思想特色	余光贵	(368)
道家、道教的管理智慧	冯 军	(370)
宗教道德的社会历史作用	陈 霞	(374)

宗教之思

论宗教对文化的影响

冉昌光

—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一定时期人类的思维和认识水平,体现了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方面的探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宗教独立成为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整个文化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早期,原始文化是在原始宗教的母腹中孕育、成长、诞生的。原始宗教是原始文化发展的直接动因。原始文化包含在原始宗教之中,原始宗教体现着原始文化。在人类的活动中宗教与文化共同发展,体现着人类早期的精神。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逐渐提高,原始宗教进入古代宗教,宗教从文化整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种文化形态。这时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就成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决定宗教,宗教体现文化。文化是本质性的,宗

教只是文化的一种形式。一方面,宗教依赖于文化,每一种宗教都有它的文化前提,不同的宗教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体现了迥异的文化传统。宗教在本质上是不同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性、神话性和寓意性表示,它不能脱离民族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宗教也给民族文化以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从整体上影响民族文化精神。以中国道教为例,道教的产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的鬼神崇拜、神仙方术及老子的宇宙观、社会政治思想、人生处事和修养原则等古代文化的内容。道教从宗教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这些文化,形成了“长生久视、全性葆真”的基本的教义和道教的思想体系。道教产生以后从各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比如对中国古代的医学、药物学、文学艺术及民俗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道教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上,强调以人为本,影响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谓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指体现在各种文化现象中最深层次的内在的动力和思想基础,是指导和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最基本的思想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的传统,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风貌。道教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两个方面。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别之一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天人相分,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天人之分”,“人能胜乎天”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不占主导地位。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反对把天人割裂、对立起来,而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在他们看来,天

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统一。所以，天人合一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般认为天人合一是儒家的思想，不可否认，儒家在天人合一的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道教也力倡天人合一，对此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道教在天人合一方面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主要的有天人同源同禀。道教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存论出发，提出：“人与物类，皆禀一元之气而得生成”^①。因此，“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②。人与天地万物在本原上和禀受上是同一的。道教不仅主张天人同源，而且进一步提出天人同构、天人同律、天人感应相通来论证天人合一的思想。它把天人相类比，认为人与天地具有同样的形体结构，提出了：“人身一小天地，天地一大人身”的概念。《太平经》说：“人取象于天，天取象于人。”“人同天地，以心比天，以肾比地。”“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与天地同一阳阴也，”等等。这种比附虽然不科学，但它会使人产生一种从关心和爱护自身出发去保护自然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

道教不仅认为人与天地在形体结构上是相应的，而且认为人生命活动的节律，如气血之循环等，与天地日月之运转、一年四季之变化规律也存在着一致性，从而提出：“人之一身，亦体天地，其中阴阳升降，亦与之符契。”^③“人身法天象地，其气血之盈虚消息，悉与天地造化同途”^④。“气液升降，如天地之阴阳；肝肺传导，若日月之往复，”^⑤等等。道教因此而要求修炼者必须严格按照

① 《道藏》第22册第383页。

② 《道藏》第33册第129页。

③ 《道藏》第20册第46页。

④ 《道藏》第20册223页。

⑤ 《道藏》第4册第664页。

日月的盈虚消长进行运作,以调理人体系统的阴阳运动节律,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应该说这些看法是有一定的道理,它直观地猜测到了生物节律与环节的关系。现代科学已证明生物节律的变化与外界环境的周期性变化确是密切相关的。

为了贯彻天人合一,道教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环境。《太平经》提出:人应该“助天生物,助地养形”,使自然界能够和谐地发展。为了保护环境,道教在其戒律中作了种种规定,如不杀生,反对惊吓、虐待动物,“不得焚烧野田山林”,“不得妄伐树木”,还规定了要保护土地及水资源。《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规定“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不得妄凿地毁山川”,“不得竭水泽”,“不得妄开决坡湖”等等,这可以说是全面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些规定。

当然,道教在天人合一上也继续了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太平经》认为:“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人的一言一行,均受到天的监视。“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天人“以类遥相感动”。它企图以天人感应之说来警示人主,要他们替天行道。道教不仅把天人感应应用于政治上,而且把它作为一条普遍原理贯穿于各种方术之中,如祈雨祷晴术,就是以人的行为去感动上天,使其按人的需要天晴或下雨。天人感应是夸大和歪曲了自然感应的作用,这是不科学的,但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人类活动,人类活动也会影响自然界。这是天人合一的本义之中的。

道教的上述思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丰富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内容。可以说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教的天人合一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当然,道教讲天人合一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是不完全相同的。儒家讲天人合一主要是想从自然法则中找到封建秩序、封建伦理的根据,而道教讲天人合一,主要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探究生命奥秘,发现炼养成仙之道,以期在更高的层次上复归自然。这两者虽然侧重点不同,但究其理性实质而

言都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内容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观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但是，从其主要思想来看，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强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的思想，对民族文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非常有价值的思想，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我们民族文化对人类的贡献。它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灾害频繁等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来说具有现实意义。

在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方面，道教也有丰富的思想。以人为本是指在天地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神之间以人为中心，人是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这向来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儒家具有丰富的思想，同样，道教也对这一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道教认为人与万物同生于“道”，而在万物中人是最为宝贵的。《太平经合校》提出：“人乃天地之子，万物之长也”。《妙真经》又进一步阐述“一切万物，人为最贵。人能使形无事、神无体，以清静致无为之意，即与道合”。为了论证“天生万物，人最为贵”，道教进一步解释说，人是万物中最具灵性的，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抱朴子内篇校释》说：“有生最灵，莫过乎人。”“夫陶冶造化，莫灵乎人。”道教从宗教学的角度肯定“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何承天语），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是符合科学的，从而令人佩服地说明了在天地之间、人神之间人的中心的位置。既然人是中心，又最有灵性，因而人的生命也就最有价值，最为宝贵。道教认为长生才符合道，提出“真道好生而恶杀。长生者，道也；死坏者非道也。死亡

乃不如生鼠。故圣人教化，使民慈心于众生。生可贵也”^①。“夫稟气含灵，唯人为贵。人所贵者，盖贵为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②“夫万物以人为贵，人以生为宝。……一切皆知畏死而乐生”^③。生命是无价之宝，不可论价，任何东西都不可与之交易。“生之于我，利亦大焉。论其贵贱，虽爵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论其轻重，虽富有天下，不足以此术易焉。故有死王乐生鼠之喻也焉”^④，道教据此建立了自己的生命理论观，其最终目标是要拯救人类脱离死亡的命运，让生命升入永恒存在的境界，反对以生命换取世俗的功名利禄，认为修身得道，长生久视乃最大的富贵。道教主张修道成仙，长生不死，是违反科学的，但是道教推崇人的生命值，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是一种超越，它克服了儒家学说中那种抽象地谈人，主张“杀身成仁”的局限性，使以人为本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因而要做到以人为本必须善以待人，要从每一个人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这不能不说是对以人为本的思想的深化。

当然，宗教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影响不只是道教，其他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对信教民族的文化精神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当代西方文化哲学家、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 1889—1970)“认为宗教是理解文化的关键，在文化的形成中起着重大作用，‘甚至一种很明显地属于彼岸世界、似乎是否定人类社会的所有价值和标准的宗教，也仍然会对文化产生刺激作用，并在社会变革运动中提供推动力。’……宗教在任何文化中产生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东方国家长期稳定的文

① 《道教要籍选刊》，第八册，第388页。

② 《养生延命录·序》，《道教要籍选刊》第九册，第397页。

③ 《养生延命录·序》，《道教要籍选刊》，第八册，第504—505。

④ 《抱朴子内篇》校译本，第259页。

化与社会制度，不能说与其宗教精神无关，而西方文化的扩张性质和变动不居，乃由于基督教中变化不息的精神。道森在书本中用中世纪西方发展的史实说明：西方文化的推动力量，正是普世主义的基督精神，这种精神要努力将自己融入人性之中，想要努力改造世界”^①。这也就是基督教对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影响。

宗教不仅从整体上影响民族文化精神，而且从思想内容到形式对各种文化发生深刻的影响。纵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文化形态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但那些直接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书法、绘画、雕塑、建筑等无不打上宗教的印痕，就连那些作为各个时代上层建筑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和制度、道德规范等也深受宗教的影响，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宗教的思想。

二

宗教具有向组织外传播教义，发展信徒，扩大组织的特点，这一特点又决定了它自己具有特别的传播方式，往往是派出教职员跨民族、跨地区、跨国家的进行传教活动。由于进行传教的教职员的特殊地位和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与发展。从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交流来看，从东汉时期开始随着佛教东进，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文学、数学、天文学、医药学、逻辑学、哲学等等，几乎包括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这些外来的文化和我国文化相结合，被我国文化所吸收，丰富和发展了我国

^① 何光沪《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序，见《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文化,也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得到发展。

不仅佛教的传播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而且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更是促进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如数学、物理、机器制造、天文历法、地理测绘、医学、建筑等传入中国,在中国得到发展。自明中叶以后,罗马教廷为配合欧洲殖民势力向中国的扩张,派出成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这些来华的传教士中,许多人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掌握了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比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奇器图说》、《泰西人身概说》等等科学著作都是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传教士或者举办教会学校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或者通过编译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或者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介绍并运用这些知识。他们的传教活动对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展在客观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是西方文明揭开了古老的中国文明的新的曙光,成了古老的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催化剂。

宗教传播促进文化交流不仅表现在正常的传教活动中,而且还表现在宗教向外扩张的宗教战争中。以十字军东征为例,可以说发生在 11—13 世纪末长达近 200 年的十字军东征是一场侵略和掠夺性战争,给当事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是历史的结论。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场宗教战争对于文化交流却又具有积极的意义,大军卷起的风暴冲荡着欧洲,漫长的征途构成了欧洲中世纪的一段历史。从此以后,这段历史引起了无数的历史学家的注意,激发了他们的研究热情。欧洲的、美国的、俄国的、中国的学者都用不同的风格笔调评价着这场“十字对半月”的战争。有的历史学家指出:“十字军远征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不限于宗教史的范围。这个运动在形式上是宗教的,但对历史的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的进程给予了重要影响;”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十字军远征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它对西欧发展的意义却是极端伟大的……十字军远征帮助欧洲人认识东方的工农业技术。在这个时期,欧